

小說創作與女性自我啓蒙

施 瑋¹

女性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深廣的話題。從古代到現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時代對女性及其在文學中的表現持有不同的態度和觀點，而女性的文學創作的性別表述，記錄着女性自我啓蒙的軌跡。

一、女性寫作與自我啓蒙的歷史進程

在很多古代文學中，如希臘、羅馬、中國古代文學，女性常常被塑造成某種象徵，如家庭的守護者、愛情的化身、純潔或墮落的代表。但在這些描述中，女性的聲音和經驗常常被男性視角和觀念遮蔽或曲解，即使在現當代，女性作家仍然成為所在時代女性自我啓蒙的開拓者和記錄者。

中世紀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往往受制於宗教觀念，她們被塑造為聖潔的瑪麗亞，或是熱情的戀人，或是情欲危險的誘惑者。但即便是在中世紀宗教文學的寫作中，也仍有不少出色的女性寫作者，她們借着傳記或小說的創作來反思和構架女性獨立的生存意義、價值結構，從社會性和個體生命兩個方面探索突破的可能，以及超越所在時代的女性被造的意義和“真相”。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女性作家如克里意大利詩人斯蒂娜·德皮桑開始提出對女性地位的質疑，為女性文學權利發聲。直到十九世紀，隨着女性主義的崛起，女性在文學中的地位逐漸上升。女性作家如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和

¹施瑋，博士，詩人、作家、畫家。國際靈性文學藝術中心主席，歷任多種文學報刊、叢書、詩選的主編。

夏洛特·勃朗特開始展現女性的內心世界和社會地位。新批評主義和結構主義為文學理論提供了新的工具，使我們能夠更深入地分析文本中的性別動態。而女性作家在小說創作中，也開始更有意識地進行自我啓蒙與自我完成。

伴隨十八世紀啓蒙思想產生的女性主義主要以女性經驗為來源與動機，追求性別平權的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包括消除性別定型觀念，爭取教育、職場的平等機會，注重性別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動婦女的權利和利益等議題。提供了一系列性別歧視造成的女性命運悲劇故事的創作，追求與男性平等成為這個時期女性小說創作中的訴求。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女性主義小說以及許多女性作家寫的非女性主義小說，都與女性主義政治活動一樣，挑戰諸如生育權、墮胎權、受教育權、家庭暴力、產假、工資平等、選舉權、代表權、性騷擾、性別歧視與性暴力等等社會議題。探究的主題包括歧視、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關於性的物化）、身體、家務分配、壓迫與父權。這個階段中的女性小說創作雖然強調女性的權力，但對於生命價值和生存意義的思考仍缺乏性別超越性，缺乏獨立個體的自信與自足。這階段的女性自我啓蒙仍具有強烈的對應性，對應着社會性的男權和生命性的男權。

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它誕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歐美，現在仍在繼續發展中。它是女權主義運動高漲並深入到文化、文學領域的成果。女性視角從文學創作進一步發展到了文學批評，其研究對象包括婦女形象、女性創作和女性閱讀等。它要求以一種女性的視覺對文學作品進行全新的解讀，對男性文學作品中歪曲婦女形象進行了猛烈批判；它努力發掘不同於男性的女性文學

傳統，重評文學史；它探討文學中女性意識，研究女性特有的寫作、表達方式，關注女作家的創作狀況；它聲討男性中心主義傳統文化對女性創作的壓抑，提倡一種女性主義寫作方式。女性主義批評在發展過程中廣泛改造和吸收了，在當代西方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批評的思路與方法，體現了它的開放性，增強了它對父權中心文化的顛覆性。

可以說，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與發展，為女性作家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視角與思想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更為獨立、自由的思想空間；為女性作家進一步脫離潛意識的性別依存，讓小說創作中的自我啓蒙進入“去性別化”的人文啓蒙打開了一道大門。我認為，直到這時，十八世紀開始的啓蒙運動才在女性作家和女性知識份子中得以完成。

二、女性寫作與自我啓蒙的東西時差

上面我簡略敘述的是歐美女性文學與自我啓蒙進程，相對來說，漢語文學的女性小說創作中的自我啓蒙要延遲幾個世紀。下面，我以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三波浪潮為時間軸線來相對應地看東西方女性文學自我啓蒙進程的時間差。

第一階段屬於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開始的反對選美的運動。在這一階段，女性主義批判女性的異化與時尚美女情結。西方女性主義運動就是從反對選美開始的。1968 年，美國女性運動的活躍分子在遊行時為一頭羊加冕，並設置了自由垃圾筒，將乳罩、腹帶、緊身裙、假睫毛一類的東西扔進垃圾筒，以表明她們的態度。在這個時期中國正處於一片藍灰的“無性別”

時代，其實不是無性別，而是男性時代。女性被徹底淹沒，失去性別的合理性，女性性別意識遭到壓抑、甚至抹殺。

中國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女性的性別意識才得以初啓蒙，全國各地的選美運動是對女性生理獨特性的一種肯定，此時，女性完全以得到男性的欣賞為滿足，“女為悅己者容”成了中國女性終於可以公開宣稱的內心審美和價值觀底色。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女為悅己者容”始終就是中國女性的“底色”，藍灰色時代祇是壓抑了這種審美和價值觀。

中國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有一個與世界文化思想短暫接軌的時期，產生了一些數量並不多的女性作家的小說，其中的女性人物脫離了男權審美的視角，甚至脫離了男權對女性的定義和限制，以獨立的、“去性別化”的人格，對社會、歷史、人性、傷痛等議題進行了自由的探索與較深入的思考。

可惜的是，之後的女性寫作以不同的角度和姿態，落入同樣的中國女性思想價值底色中：“取悅男權”。甚至起初作為女性自我性別認定的女性性意識書寫，也墮落成展示女性私密、吸引並取悅男性的，“兜售”性的“身體寫作”、“美女寫作”。至此，一批少數的女性知識份子和女性文學作家，開始“逆向”寫作，有意識地從起初九十年代，追求性別的自我確認、堅持性意識的自由表達，到二十一世紀的中性定位和書寫。她們反對被稱為“女”作家，並主動以“去性別化”的中性視角來觀察和描述歷史、社會與人性。

女性主義的第二階段在西方是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這個階段，女性主義者對美的看法又加深了一步。她們把美和性別、種族、階級這些因素並列在一起，主張不同的身體、膚色、個頭、體重都可以被認可。這

被稱為在容貌和美的問題上的民主化改革時期。第三階段開展了關於美貌的論爭（beauty debate）：女性主義應當贊成美還是反對美？贊成麥當娜還是反對麥當娜？贊成美容手術還是反對美容手術？美的民主化系統被提出，即由每個人自己來決定自己在美貌問題上的選擇。

在這兩個關於美的認知階段中，女性不再處於男權之下來確認性別，也不再處於對男權的抗爭來否認性別，而是可以真正獨立地，以被造者對造物之平等、美善的認知和信心，來接受、欣賞、並探索自身的性別。這兩個階段的思想發展，對中國新生代作家和少數海外學者型及知識份子作家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對中國及海外的大部分女性作家的寫作的影響仍微小並且不確定。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華語文學女性作家的創作，特別是小說創作，其女性意識的啓蒙進程一方面遠遠落後於歐美，另一方面卻因着互聯網和新移民及留學生的移居生活，而存在着飛速遞進、跨越代際、甚至彎道超車的現象。這是可喜可盼望的，但值得注意的兩點：一是目前女性寫作中自我啓蒙的非自覺性，造成了個體的不穩定性和群體的巨大參差不齊；二是目前女性批評的學者大都在中國本土，她們在女性自我啓蒙的思想進程上落後於創作者，造成了文本正確解讀的缺失，同時也影響了女性創作者自我認知的自信與創作的穩定度。

三、小說創作對於女性啓蒙的意義

我們再來綜合地看一下小說創作對於女性自我啓蒙的意義。小說創作作為女性啓蒙的媒介具有深遠的意義和重要性，它不僅僅是文學的一個分支，

還是女性身份、思想、觀點、權利和覺醒的重要載體。這裡，從媒介的角度來談，就包括了小說創作對於女性作家的自我啓蒙的意義，以及小說閱讀對於女性讀者和整個社會的啓蒙意義。

女性的小說創作可以展現女性經驗。傳統的社會文化以及文學批評往往是由男性主導，他們的視角、經驗和語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主流。但小說創作為女性提供了一個展現自己真實經驗、情感和生活的舞台，使得女性的聲音得以在文學中體現。通過小說，女性作家可以對社會的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和對女性的歧視進行批判。例如，簡·奧斯汀的作品揭示了十九世紀英國上層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和限制。

女性的小說創作可以啓發女性覺醒：小說作為文化的一部分，能夠影響和啓發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通過閱讀與自己經驗相似的故事，女性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價值，獲得對抗社會壓迫的勇氣。小說可以展現女性的多重身份，提供的女性身份、命運、審美等多樣性，打破“女性”這一單一的標籤，展示她們是母親、女兒、戀人、工作者、探險家等多重角色。女性小說提供了跨文化和跨時代的視角。小說可以跨越時空，為讀者提供不同文化和時代下女性的生活和經驗，這也有助於加深對女性經驗多樣性的理解。

鼓勵女性進行文學創作，可以幫助女性有意識地自我分析、自我認知、自我啓蒙、自我成全。寫作在今天這個網絡發表和網絡閱讀的時代，已經不再祇是精英女性知識份子的專有工具，已經成為迷茫而孤獨的現代女性，包括少女、學生、未婚女性、職業女性、家庭主婦、空巢中老年女性的樹洞和方舟。而這樣大群體、多層次的創作，不僅記錄了女性的物質和精神的生存狀態，也能提高社會對女性的認識和理解，因為不僅是女性，男性讀者通

過閱讀女性小說也可以增進對女性的理解和尊重，促進性別之間的和諧和理解。

因此，小說創作對於女性啓蒙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它不僅為女性提供了表達自己的舞台，還為社會提供了了解和認識女性的窗口，進而推動性別平等的實現。

新移民文學是指由中國大陸移居他國後所創作的文學，這部分文學通常涵蓋了作者在異國他鄉所面對的文化、身份和族裔等問題，以及與祖國和傳統之間的複雜關係。在這類文學創作中，女性意識的認知具有相對的獨特性。作為移民和女性的雙重身份使得她們在新國家中經常面對文化和性別的雙重衝突。例如，在一些保守的華人社區中，傳統對女性的期待（如家庭職責、傳統角色）可能與西方國家的女權觀念產生碰撞。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出來的新移民對女性角色的認知，與老移民及臺灣出來的移民對女性角色的認知之間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張力的碰撞，這種張力和碰撞能夠打破原有的固定認知，產生看似混亂、發散，實為自由的探索。

新移民女作家們不僅探索自我的女性身份，並且需要探索自己的社會身份。作為移民在異域生存，其社會身份的焦慮是大於性別身份的，於是，移民的生存處境讓女性寫作者比較自然地，從女性的觀察和思考角度過渡到相對中性的觀察思考角度，產生了一些新移民文學中女性作家自我認知的人文獨立性。但目前，因為新移民文學中活躍的女性作家年齡偏大，女性意識陳舊，加上大多是感性的、自發性的寫作，缺乏自覺的人文思想的思考，故而這個相對中性的寫作角度的優勢，還有待更年輕的作者們進一步呈現出來。

在新移民文學中，女性角色常常處於自我探索的過程中，她們試圖在傳

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找到自己的定位。女性移民不僅因為種族和文化背景而被邊緣化，同時也由於性別被邊緣化。這種雙重的邊緣化給她們帶來了特殊的挑戰，也為她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靈感。

在移民文學中，“家”是一個核心議題。對於女性移民，家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更是情感、記憶和身份的載體。她們在文學作品中探討家的真正意義，以及如何在異國他鄉建立新的家園。許多新移民文學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社會變革的推動者，她們挑戰傳統觀念，努力為自己和團體爭取權利。儘管面臨種種困難，許多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展現出了巨大的力量和韌性，她們不僅為女性爭取權利，也為家庭和社區提供支持。

總的來說，華語新移民文學中的女性意識反映了女性在移民過程中所面臨的特殊挑戰和機會，她們的經驗是華語新移民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窺視不同文化、性別和身份交織的複雜性的窗口，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女性移民的生活和挑戰。

四、從小說《世家美眷》看女性的自我啓蒙

我的第一部長篇家族小說《柔若無骨》（後更名為《世家美眷》）寫的是：從清朝末年到北閩戰爭；從抗日解放到三反五反；從文化大革命到經濟改革，在這近一個世紀的中國現代史的風雲背景中，姑蘇陸家的狀元府宛若狂風巨浪中的“方舟”，嫁出娶進的美人們被捲進戰爭、革命、金錢的風暴。小說描述了陸文蔭、陸文芯兩姐妹與男人們相互戀慕也相互利用的一生愛恨。愛或欲都無法填補她們裏面巨大的虛空，世事風雲卻一次次將她們孤獨地拋入生存的旋渦。陸家三代的如花美眷們，在不同的時代裏，在名利情愛的不同

追逐中，將渴望躲避的男人們逼得走頭無路，而她們自己也祇收穫到虛空，終究在似水流年中老去。我曾用四句話總結過這部小說的內容，這也是當時三十歲的我借着回顧書中“奶奶”的一生，形成並表達的女性意識。我當時的女性意識雖然非常具有超前性，但女性仍是相對於男性而存在的。

“男人女人，綿延不絕的戰爭；男人女人，愛恨情仇的糾纏；男人女人，互為依存的一體；一個世紀的風雲，生存情愛的警世，祇在她的回眸中。”

海外文學評論家陸士清老師對這部書的評價是：“《世家美眷》輝耀着女性意識的光芒，它比我所讀到的所謂女性主義小說，在男人與女人兩性這個最根本的關係上，顯得更強烈和更鮮明。它以女性的視角，挑戰了世俗文化中男人性意識的特權，生動地詮釋了女人的需要，在性意識上男女應是平等的，也指出男女性愛必須昇華精神品質。也許這就是這部小說的思想藝術意義。”

這部 1995—1996 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從其表達的女性意識的自覺、自啓的程度來看，在中國文學女性書寫中至今仍是相對超前的。原因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它屬於九十年代中國女性文學書寫自由且本真的“黃金時期”。既徹底掙脫了過去的女性意識在書寫中被壓抑、被簡化、被忽略，也沒有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女性意識寫作的商品化和物質化，成為以真實筆觸進入的對女性意識的探索，摒棄男權文化強加的羞恥感，坦然地直面女性在性欲、生存和情感方面的真實。這個寫作過程也成為年輕女作家對女性意識的自我啓蒙過程。

這個世界上的人就分為男人和女人，似乎女性的存在就無法離開男性。在這部小說中，我是從女性的角度來寫整個百年中國現代史的，視角是女性主人公，故事是女性的命運，內在趨動力是女性生存、情感和性欲的需要。

小說起初構思時的書名是《吮吸》，更為直接地表達了我當時對女性生存的思考，我認為女性需要具有極強的、自覺並主動的“吮吸”能力和行動，才能滿足生存的需要。並且，我當時認為女性對社會物質和精神靈性的吮吸都是通過男性而達成的。於是，表面上看是女性依賴於男性，實質上具有自覺意識的女性是獨立的，她們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生存環境中，為了自己不同的需要，精神的、情感的、性欲的、生存的、身份的、夢想的……等各種需要選擇某個男性或多個男性作為媒介，來吸取所需的養分，得以滿足她們生存的必需。

《世家美眷》對社會的百年歷史變遷、民族的離亂悲苦命運並沒有進行中國文學男性視角慣常的宏大敘事，而是將宏大敘事中社會與民族中的“邊緣”“弱者”“配角”甚至的“符號”的女性作為描述、聚焦的主體，她們為生存而進行的一系列掙扎既是主動的行為，同時又是被動地被拋在歷史的波浪中跌宕起伏。這就形成了女性意識的輝煌與女性命運的悲劇，兩者形成張力又相互成全的獨特的藝術魅力。

在這部小說中，陸文蔭雖然女性意識非常覺醒並強悍，但在她的認知中，女性仍然祇能依靠或借助男人而存活。起初她在物質和精神上都依靠丈夫方耀堂，當方耀堂長期不歸的情況下，她的情感一度轉向評彈藝人薛雲飛，轉眼薛雲飛就因為演出而被當作親日分子遭刺殺，陸文蔭得到的僅是一個私生女。日軍投降，父親又被當作漢奸處死。至此，陸文蔭在精神和物質上的生存支柱都失去了，好在丈夫有了消息，在青島當上高官。於是，她又趕往青島，與另一個女人王岫煙爭奪這個男人，其實也是爭奪獲取精神與物質的生存媒介。這種爭奪直到男人被毀前程，逃往上海。新中國成立後，丈

夫不僅不再是物質生存的依靠，他與情人在香港的見面，使他也不再是精神和情感的依靠，甚至他成了對女人與孩子的生存具有破壞性的危險因素，這時，陸文蔭將其送入監獄也可以說是特殊時代女性的自我保護。

在喪母、喪子、離婚的多重打擊下，陸文蔭選擇了可以提供物質和情感的廖思城成為情人，以及到文革中讓私生女嫁給漸漸要離開的廖思城，這一系列的選擇與行動還是出於陸文蔭的女性認知，她的女性意識啓蒙的程度超越了傳統女性被動地依靠男人、聽任擺佈，但仍沒有達到自足和獨立。

在女性意識自我啓蒙的進度上，妹妹陸文芯與姐姐陸文蔭不同。起初，陸文芯是比姐姐更被動的，16歲的陸文芯被動地嫁給了39歲的上海富商王福仁，並在新婚夜認識了其弟弟，腿有殘疾的畫家王福義。由此，她在物質上依賴丈夫，在情感上她懷了王福義的女兒並希望依賴於他，但王福義躲開了，這使陸文芯在情感和精神方面早於姐姐進入了獨立狀態。雖然，之後王福義從日本人的刺刀下救了她和腹中女兒的命，但他始終沒有成為陸文芯的依靠。當丈夫也有外遇後，她的情感就更為獨立了。這也導致了，當陸文芯出任德恒紗廠董事長，並成為第一批公私合營廠的37歲的女廠長時，她與王福義在精神上已經漸行漸遠。至此，陸文芯完成了真正在物質和精神、情感上的完全獨立，當然她也就必需承擔自我獨立、自主選擇所帶來的一切。

可惜，在獨立承擔命運這方面，陸文芯的女性自我啓蒙並沒有完成。當她失去工廠，又遭女兒告發，並被工宣隊的王虎柱強暴後，她崩潰並跳樓自殺了。雖然這是一個悲劇，但從女性意識自我啓蒙的角度來看，陸文芯比姐姐陸文蔭向前走了一大段，因為她抵達了不再依靠男性為媒介，直接以獨立的人格經歷命運的狀態，雖然這種狀態中被動的因素大於主動的因素。

五、當代知識女性角色與女性啓蒙

我移民美國後，先後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放逐伊甸》和《紅牆白玉蘭》。這兩部小說都是以中國知識女性為主角的，其書寫過程也伴隨着我移民海外後所受到的美國女性主義的影響。這就形成了在時空和文化上拉開距離的審視與分析，使得創作過程中的女性意識自我啓蒙更具自覺性，感性的體驗和認知與理性的抽象哲思，更為交融、互動。

從創作時間上來說，《放逐伊甸》寫於出國後的 1997 年至 2007 年，前後修改了七稿，2014 年又為再版修改了一稿，也恢復了當年出版時被刪減的部分。《紅牆白玉蘭》寫於 2004 年至 2007 年，這時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十年，相對《放逐伊甸》的寫作時間來說，所受到的世界女性主義思潮和生活狀態的影響更為深入，不僅在理性的哲思上更為完整，在感性的認知上也更為豐富。

《放逐伊甸》的內容是以“回望”來書寫中國大陸知識精英的女性意識；《紅牆白玉蘭》是以反復“跨越”，時間上跨越中年與青年，地域上跨越美國和中國，處境上跨越文化和職業……從而形成對更為廣泛的對女性生存和命運的思考，並探索更具有當下和普世性的女性意識的反思。這兩部書中的女性角色眾多，但主角都是中國女性中最具女性意識自我啓蒙代表的知識女性，從她們在各種生存狀態中的選擇，和她們對於命運各節點的反應，來呈現出中國現代的女性意識。

長篇小說《放逐伊甸》以現代人靈魂及生活墮落的過程，與舊約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的過程相疊映，描寫 90 年代中期一群生活在北京的中青年知識份子（作家、詩人、書商、導演、IT 精英）的生活、愛情與心靈痛苦尋覓的故事。他們的生活、理想、愛情、心靈都在世俗之潮中，在金錢的風暴中被顛覆、失

重。作品以知識女性的視角、以細膩的筆觸描述了現代人在良知、婚姻、性愛、謀生等生活各方面的尷尬、混濁與無奈，以及他們的掙扎與盼望。主人公李亞放縱尋死，卻死而得生；趙溟躲避等死，卻終被良知喚醒；戴航遊離於生活，卻無法放棄對愛與純潔的渴望。他們都絕望地感受着夢與“樂園”的遠離以至消失……小說對生與死、罪與良心、愛情與金錢、婚姻與倫理進行了描述、置疑、思索，記述了處於中國社會經濟大變革時期的這一代人，他們精神上追求與認知的心路歷程，讚美了人對真理的嚮往與執著。

這是一部關於中國知識份子的，偏哲理性的長篇小說。學者宋曉英稱這部小說呈現的是“現代”語境下“知識份子”的存在狀態，她說：“北美華人女作家施瑋的小說《放逐伊甸》生動地描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受人文主義洗禮的一代人，怎樣被九十年代的社會裂變所裹挾，在時代大潮中掙扎、失落及頓悟的過程。這些五六十年代生人已經形成了‘重精神、輕物質、拷問靈魂、省問良心’的人格，不僅因為他們出生於‘詩書鼎禮’的中國，而且因為他們在八十年代初經歷了一個‘啓蒙時代’。經年之後，理想主義的光芒減弱，經濟的大浪淘沙開始，他們‘找不到出路’，無法判斷是時代還是自我的錯誤，陷於困惑掙扎、漂泊無依、亟待救贖的存在狀態。”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背景中，小說也借着幾位女性角色對女性知識份子在此時期中的女性意識進行了真實而豐富的呈現。女主人公戴航聰慧、敏感、觀察世相透闢，同時又單純、純樸，是一個有才華、有成就、可以獨立思考及獨立生存的女性，但她的人生夢想的終極目標卻是“愛情”，一份純粹的相愛與恒久的相守。於是，她的人生就成了一個矛盾體，一方面在理論和觀察上，她的女性意識已經啓蒙，對世事、男女都有清醒的認知；另一方面她

在情感上慣性地以男女間的童話式純潔“愛情”為理想和生命基石，沒有能進入真正的女性生命的獨立，於是悲劇和痛苦就難免了。她與李亞的關係從真實脆弱的“純粹”，到在商品經濟浪潮中變得混雜，最後終於顯出了“虛假”的本質。

“清醒後的兩人看到了情感的虛妄與自己的不敢承擔：從前是怎樣不負責任，借了一個‘相互尊重’做幌子，妄言給對方選擇的自由。自此，李亞躲到了更加放浪形骸的狀態之中，戴航逃到了南方，自己的故鄉，去追尋父母的婚姻秘密，她還有對生命中缺席的‘父愛’的期待。可那個‘幻想’裏‘慈愛而偉大’的父親不但是個沉浸於棋局、煙酒中的無賴，還是一個借助於時代的專政工具而公器私用的狹隘的復仇者。”（宋曉英《“現代”語境下“知識份子”的存在狀態》）當戴航直面了情人和父親這兩位男人的真實後，她不得不將生命的意義回歸到自己身上，之後她投入到將小說改為電視劇本等工作，是戴航女性意識成長的一個外在表現，反映了她在這個社會大動盪時代中，不再躲在男人背後，不再躲在“愛情”中，而是獨立地面對並選擇在這個時代中生存的方式。之後她雖然仍愛李亞，也曾去看望他，但李亞和她父親都不再是她物質和精神的依靠。

趙溟的妻子王玲原本是一個工科大學生，她崇拜並嫁給了詩人，她以詩人丈夫為自己的夢想，希望他成為自己的精神支柱。但事實上，在他們的婚姻中，敏感、脆弱的詩人趙溟是以妻子的“一頭直發”為精神支柱的。這內隱的“真相”因為改革開放外在社會環境的巨變而被外顯出來，這一真相的突現，讓男人自我懷疑、怨天尤人，行為和情緒都呈現出有點扭曲、頹廢的狀態。原本這祇是在社會變革中的自然現象，但因為王玲對丈夫崇拜的倒塌使得這個家

庭的失去平衡，盡乎要倒塌，王玲也幾乎要轉向另一個男人洪京濤懷中。

詩人趙溟和電腦公司儒商洪京濤分別代表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偶像”，如果王玲最後嫁給洪京濤，那麼她的女性意識就完全沒有成長，仍是以男人為“天”，以男人為崇拜的偶像和生活的依靠。但可喜的是她的女性意識成長了，她最後是以獨立的女性人格，返身重新欣賞、愛上丈夫趙溟，並成為他的幫助者。

王玲回到他們婚姻的小屋“追夢小屋”時，看見很久不再動筆的趙溟正在奮筆疾書，她拾起落在地上的稿紙。“多年前的王玲、多年前的趙溟、多年前他們曾共有的夢又都向她湧來。在这一切之中有一種她不明白的光與溫暖也向她湧來，並覆蓋了她，令她安寧得要哭出來。這些陽光般如詩的語言，這些娓娓訴說的陽光，都滲進她乾枯的骨縫裏。”這一刻是美麗而動人的，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點，但更美的意義在於這不是“原點”，重新回到“追夢小屋”中的男人和女人是兩個分別獨立的人，他們是以獨立的人格重新相愛，並同行追夢。特別是王玲，她不再是崇拜、依靠丈夫的小女人，而是以一個欣賞、理解、幫助者的身份來愛他。

六、在婚戀小說中的自我探尋與成全

《紅牆白玉蘭》寫的是旅居美國的華裔女作家、心理輔導師秦小小即將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在洛杉磯機場她遇到了一個最不想見的女人李紫煙，李說出了多年前的秘密，這個秘密關係到五個青年男女之間彼此糾結、猜疑、執手、錯過的一段情緣。孤兒楊修平與養父母的女兒，有孕遭棄的紫煙領了結婚證，說好為期一年。但一個月後他在大學沙龍中遇見才女秦小小，他們相愛，

卻誤會重重。秦小小、楊修平、李紫煙、王瑛、外國留學生約翰（柳如海）等，各自為了愛捲入、並也一磚一磚地築成了一段差亂的命運……

分離十五年後，四十不惑的楊修平和秦小小終於再次相見，卻各有家庭。他們在一夜相擁後彼此逃開，遠隔太平洋，忍受着心靈與肉體的感應和道德的自責。但意外查出的病魔打破了秦小小的自控，她渴望在失明前再看一眼青年時深愛卻錯過的人，她再一次飛回中國。就在楊修平和秦小小兩人決心不顧一切成全年輕時就執著於心的“愛情”時，他們各自平凡婚姻中似乎沉默的、無知無覺的“愛”，卻也在此時各自絢麗綻放，逼使他們重新面對情感與存在的“真相”。

這部小說探討的是現代都市男女之間關係的問題，是一部婚戀主題的小說。“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再沒有哪個字眼像‘愛’這樣容易言出，卻難於實踐；沒有哪句表達像‘愛’這樣容易被誤讀、濫用，且很難獲得清晰明確的解答；也沒有哪種情感能像‘愛’這樣令人刻骨銘心，又讓人困惑惆悵了，誠如古代詞人元好問所言——‘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在所有的愛情故事中，最令人嚮往的莫過於‘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和美，最令人悵然的莫過於‘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的無奈，而最讓人心痛的也許就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遺憾了。並不是相戀的人不曾用心珍惜過，但世事的無常與人性的軟弱常常使真心相愛者彼此錯過，抱恨終生……不可否認，彼此相愛最深的人往往也會成為彼此傷害最深的人。這種愛恨交織的情感，就是相戀者渴望擁有對方，卻因種種原因不可得而造成的。祇有當彼此放下自己，更看重對方的存在和需要時，才會迸發出全然無己的摯愛之情。施瑋的小說《紅牆白玉蘭》寫的就是這樣一個故

事。”（張鶴《在孤絕與超越之間——評施瑋小說〈紅牆白玉蘭〉》）

“紅牆”與“白玉蘭”分別是小說上下兩篇的主體意象，紅牆象徵命運，命運之牆是人一個個選擇構成的，每一個選擇就是疊上去的一塊磚，最後形成的命運之牆是人選擇的結果，卻也是人無法逾越的。我在通篇小說構架的哲學邏輯上，借鑒了當時正在學習的西方心理學臨床輔導的模式，在“紅牆”這個意象中表達了女性意識自我啓蒙的新的認知：命運並非外在的、強加的，女性意識中的被動性被進一步突破。如果說《世家美眷》和《放逐伊甸》突破了女性相對於男性的被動地位，那麼《紅牆白玉蘭》中就進一步突破了女性相對於命運的被動地位，認識到命運其實是女性在不同生命階段中的每一個選擇所形成的，它準確地記錄了女性在不同階段中自我意識的殘缺與不成熟，它也殘酷地呈現了這些選擇的結果。

“紅牆篇”用的是不同角色視角的第一人稱敘述，就像我們在心理諮詢師診所中聽就診者的敘述。但在總體的回溯中，小說形成了拉開距離的、相對冷靜的旁觀敘述，以便作者和女性讀者對女性意識的成長途徑，做出旁觀的、相對細緻的分析，讀者仿佛站在了心理諮詢師的傾聽視角。

“白玉蘭篇”用的是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通篇描述的是真正平等的、包容的、祛除虛幻的，“愛”就像玉蘭樹高高枝頭上的白色花朵，可以超越無法被推倒的紅牆，可以超越不法“重新活過”的命運，綻放出“愛”的純潔與堅定。

整部小說中主要的三位女性：知識女性秦小小、普通主婦王瑛、任性的現代青年紫煙，她們對“愛”的理解都有偏誤，因為她們的女性意識起初都有極大的不自覺而造成的模糊。她們的選擇和行動或出於感性的欲望，或出

於生存的“務實”。但這三位女性角色從青年到中年的過程中，女性意識都在成長，或遲、或早、或主動漸進、或被動猛醒，她們開始獨立地意識到自己對生命的自主權，以及需要承擔的與此權力相應的責任。

學者王志彬在《論施瑋〈紅牆白玉蘭〉中的女性意識》一文中說：“施瑋通過《紅牆白玉蘭》這部小說展示了自己的女性書寫和女性意識，並通過對女性成長和命運的關注更深刻地表達了對人性的思索。她筆下的女性，無論是秦小小還是王瑛，都有着她們獨特的魅力，她們用自我的覺醒與掙扎來展現靈魂的獨立與光彩，用個體的反思和向上來表達生命的價值和尊嚴。施瑋對於女性意識和人性意識的聯繫思索也體現出其對女性主義理解的獨特之處，彰顯出她作為一個女作家比較開闊的視野和格局，也給我們之後的進一步思考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文僅以自己這三部長篇小說為例，來說明女作家如何在寫作中進行女性意識的自我啓蒙，並在作品中呈現這一啓蒙的軌跡和成果。我在寫作這三部長篇的同時所寫的一些中短篇小說中，也同樣涉及到女性意識的探索和表達。但在之後的非虛構作品和長篇《故國宮卷》中，女性意識更為獨立，並趨近於淡化性別的“人性”的描述，其中不少作品開始以中性的視角，描述歷史和歷史中的女性與男性。我認為真正女性主義的成長趨向不是強調女性有別於男性的特徵，而是去除兩性對立的區別，強調人的個體性，以及人類群體性的“人性”；不是著重於女性與男性的不同，而是著重於每一個個體的不同，以及“人性”豐富而複雜的共性。